

论语

皇家
读本

张居正讲评
《论语》

上海辞书出版社

论语

张居正讲评
《论语》

皇家
读本

陈生玺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居正讲评《论语》皇家读本/陈生玺主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7-5326-1755-6

I. 张... II. 陈... III. 论语—通俗读物 IV. B222.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2601 号

策 划 张晓敏
责任编辑 陈翔燕
装帧设计 姜 明

张居正讲评《论语》皇家读本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com.cn

出版人: 张晓敏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1070 1/16 印张 21 字数 400 000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 000

ISBN 978-7-5326-1755-6/B·88

定价: 32.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512—52219025

主 编

陈生玺

副主编

贾乃谦

编 者

贾乃谦 张长法

王淑艳 康 华

序：帝王师张居正

上海辞书出版社将要出版张居正讲评“四书”系列之《张居正讲评〈论语〉》这本书，我听后稍感诧异。因为在我对张居正的研究中，无论是他自己的书信奏疏，还是《明通鉴》、《三编发明》这样的史书，均不见对此书的记载。询问编辑，告之乃据藏于南开大学图书馆的海内孤本，心下更为称奇。即请求编辑将书稿寄来一阅。读其讲评章句，乃张居正语气无疑，典型的蒙童读本。这个蒙童不是别人，正是明朝的第十四位皇帝朱翊钧。

一

朱翊钧于1572年即皇帝位，时年十岁，起用他的老师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张居正三十八岁时，就曾担任过嘉靖皇帝儿子裕王的老师。这个裕王就是后来的隆庆皇帝朱载堉。1566年，嘉靖皇帝驾崩，朱载堉嗣登大位，于当年就拔擢张居正为内阁辅臣。张居正时年四十二岁。两年后，朱载堉又安排张居正担任太子朱翊钧的讲师。就这样，张居正成为隆庆、万历父子两位皇帝的老师。

张居正四十八岁主政内阁。用他自己的话说，彼时“主少国疑”，张居正同时担负起主政与帝师的双重责任。

关于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振衰起隳的历史功绩，史家多有定评。我在这里仅就张居正帝王师的身份作一点评述。

明代的帝王师分为两种：一种是皇帝经筵的讲臣，多从翰林院中的词臣挑选；还有就是东宫的讲师，负责太子学习的专门机构即詹事府。大凡太子登基，都会拔擢自己的老师到内阁担任辅臣。明代的首辅中，不少人都是太子老师出身，因此，当太子的老师比当皇帝的老师，似乎政治前程更大。

张居正是在隆庆、万历两位皇帝登基之前，担任他们的讲臣，所以，他先后得到父子两位皇帝的信任与重用。所不同的是，他只是隆庆皇帝的讲臣之一。当时隆庆皇帝有五位老师，分别是高拱、李春芳、赵贞吉、殷士瞻与张居正，主讲官是高拱。所以，隆庆皇帝登基之后，这五个人都相继入阁，但隆庆皇帝最为倚重的还是高拱，故让高拱当了首辅。

万历皇帝为太子时，只有四岁。他六岁出阁读书，张居正成了他的主讲

官，这为张居正日后出掌内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古代，能够当上帝王师是一种难得的荣耀。古人有言：“学好文武艺，售于帝王家。”这是读书人的最高理想。但真正能实现这一理想的读书人却少之又少。明代选择帝王师，虽然有非常苛刻的条件，但已当上帝王师的，从其作为来看，大部分都很平庸，极为恶劣和出类拔萃的，都比较少。究其原因，大致在两个方面：一是挑选帝王师的条件制订有误。帝王师首要的条件是学问渊博，其次是品行端正，单从字面上看，这两条绝对正确。若要认真探讨，就会发现，在明朝，所谓学问渊博，就是对孔孟的儒家学说，做足寻章摘句阐微辨意的功夫。若培养学者，此类学问尚无不可，但培养君王，用这一套，便觉隔靴搔痒。

在读书人看来，帝王师高不可攀，但他除了“师”的身份，还有一个“臣”的身份。皇帝虽然是学生，但更重要的是“师”的主子，老师跪着进讲，而学生却坐着听。单从这一点来看，所谓帝王师，也只是一个受到尊重的仆人而已。因此，老师进讲时，大都战战兢兢，除了按当年洪武皇帝钦定的孔孟之道来讲述，自己哪敢将经邦济世的学问掺杂进去呢？

二

作为首辅，张居正是成功的。李贽誉他为“宰相之杰”，一点也不过分。作为帝师，张居正也是称职的。

隆庆皇帝于1572年旧历五月二十六日晏驾。半个月后，即六月十日万历皇帝登基。六天后，高拱的首辅被两宫皇太后罢免，张居正接任。八月六日，刚把祭祀大社、大稷的典礼举行完毕，张居正就以揭帖进奏“请以是月中旬，择日御文华殿讲读”。同时向小皇上建议：每月逢三、六、九日上朝接见大臣讨论国是，其余的日子则到文华殿参加日讲。他并亲自为小皇帝选择了马自强、许国、申时行、于慎行、余有丁等六位讲臣（这六人后来都先后入阁成为辅臣）。

当年的十二月下旬，张居正又向小皇上进献《帝鉴图说》。这本书是以连环画的形式，精选八十一则可以仿效的历代帝王治国之善举、三十六则引以为戒的祸国之恶行，讲述兴衰存亡的道理，每则故事配图画一幅。张居正主编这本书，可谓用心之深。在进疏中，他言道：

前史所载兴亡治乱之迹，如出一辙。大抵皆以敬天法祖，听言纳谏，节用爱人，亲贤臣，远小人，忧勤惕厉，无不治者。

此时的皇帝才十岁，张居正不让他死啃孔孟，而是让他熟悉历代帝王之

得失。可见，从一开始，张居正就铁定想培养一代明主而非培养一位秀才。窃以为，非有大忧患者，不会有这种大功德的举措。

《明通鉴》中，关于张居正如何作帝师的记载，有如下几则：

万历元年二月癸丑(初二)上御经筵，从张居正所请也。

一日，讲毕，上问：“建文帝果出亡否？”居正曰：“国史不载，但故老相传，披缁云游，题诗于田州。有‘流落江湖四十秋’句。”上太息，命录诗进。居正曰：“此亡国事，不足观也，请录《皇陵碑》及高祖《御制集》以上，见创业之艰，圣谟之盛”云。

三月，丙申，诏举将才。

时张居正进讲《帝鉴图说》，至汉文帝劳军细柳事，因奏曰：“古人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今承平日久，武备废弛，文吏箝制弁员，不啻奴隶。夫平日既不能养其精锐之气，临敌何以责其折冲之勇？嗣后将帅忠勇可任者，宜假以事权，俾得展布，庶几临敌号令严整，士卒用命。”乃是诏内外官各举其人以备任使。

这两则故事都发生在万历元年，神宗皇帝当时只有十岁。前则故事道出小皇帝的好奇心，想打听建文帝的下落。张居正及时阻止他的企图，因为他毕竟是高祖朱棣的十一世孙，正是他的祖先，当年发动“靖难之役”，从北京打到南京夺了侄儿建文帝的皇位。叔侄争权虽是家事，但皇位从此落到朱棣这一脉系，毕竟来路有些不正。这件事在民间一直存有非议，许多人对建文帝抱有同情。朱翊钧少不省事，才打探这件事情。张居正若附和或者怂恿小皇帝为建文帝正名，势必会在朝野引起思想上的混乱，轻者摇撼政局，重则动摇国是，因此张居正才有以上一番言语。尽管当时就有人对张居正没有借此机会为建文帝表白幽怨隐恨表示不满，但从稳定政局角度考虑，张居正采取的方法无可指责。

后一则故事更是表明张居正以史为鉴，向小皇帝灌输“富国强兵”的思想。让小皇帝由古及今，认清当朝“武备废弛，文吏箝制弁员”的弊政，并由此作出推举将才的决定。张居正通过讲授，让小皇帝得到熟悉政事掌控大局的方略。这种方法，才是真正的“因材施教”。

事实证明，张居正的教导卓有成效。万历三年(1575年)四月初一，天空出现日全食。在古代，大凡出现灾异，君王便认为是上天示警，便要立即检讨自己的过错。因此，就在这一天，小皇帝为对天象表示敬畏，在宫中制作了一块牙牌，上面写了十二件事：“谨天戒，任贤能，亲贤臣，远嬖佞，明赏罚，谨出入，慎起居，节饮食，收放心，存敬畏，纳忠言，节财用。”

当小皇帝将这一块牙牌拿给张居正看时，张居正非常高兴，趁机教导

说：“此数事者，虽因天变自警，其实修身治天下之道理全在于此。皇上可终身奉行。”接着又说：“懂得这些道理并不困难，但要身体力行就不那么容易。从今以后，皇上所作所为，凡有与所写不一致之处，应允许左右执牌以谏。”

此时，十三岁的皇帝朱翊钧，与其说是一个好皇帝，还不如说是一个好学生。他对张居正十分尊崇，冬天经筵，他亲送银炉给师相暖手，夏天调制羹汤给师相品尝。张居正主政内阁十年，朱翊钧从未喊过他的名字，总是客客气气地称“元辅张先生”。此等殊荣，当朝大臣均羡慕不已。

朱翊钧长大后，张居正对他的严格教育也未停止。万历九年二月，张居正组织一帮儒臣编写的《列朝宝训》、《实录》成书，再次呈给皇上。

两书共分四十类：即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勤学，敬天，法祖，保民，谨祭祀，崇孝敬，端好尚，慎起居，戒游侠，正宫闱，教储贰，睦宗藩，亲贤臣，去奸邪，纳谏，理财，守法，敬戒，务实，正纪纲，审官，久任，重守令，驭近习，待外戚，重农桑，兴教化，明赏罚，信诏令，谨名分，却贡献，慎赏赉，敦节俭，慎刑狱，褒功德，屏异端，饬武备，御寇盗。

从这四十个题目就可以看出，这部《列朝宝训》讲的仍是修身治国的道理。《帝鉴图说》是童蒙读本，而这部书则是货真价实的帝王学了。此时朱翊钧已年届十九，且已结婚三年，属于成年人了。张居正为他制订了更为庞大的学习计划。遗憾的是，此时的朱翊钧，已失却少年的纯真。他的祖父世宗皇帝的贪婪与刻薄，父亲穆宗皇帝的沉湎酒色等恶劣品质，已在他身上逐渐露出端倪。

三

从张居正讲评“四书”的用语来看，这部讲稿当与《帝鉴图说》同属一个时间段，都是讲给少年朱翊钧听的。

关于张居正的学问根基，一般都推为法家，但他对孔孟的儒家学说，的确也有自己的发明与创意。他不主张死读四书五经，而积极引导小皇帝参悟经书背后的内容，契合孔子发言时的心境与语境。

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给湖广提督学道金学曾写过一封信。摘录如下：

夫以孔子之圣，平生所志，惟在东周，生今反古，深用为戒。老不得行其道，犹修《春秋》以存周典，此岂以周之法独善于前代哉？盖为天下之礼宜尔也。今世俗皆称“愿学孔子”，乃不务遵祖宗之典，以服官寡过。而好言上古久远之事，以异趋为高，动循衰世苟且之政，以循情贾

誉。此岂圣人所谓“为下不倍”哉，恶在其遵孔氏也！

不穀素无学术，谬膺重任，思所以鼓驾钝，佐明主者，惟日取我祖宗之法度修明之，然十犹未二、三也。窃以为今之教士，与士之为学，皆如不穀之所以事上致理者，而后有得于遵也之义，不识高明以为如何？

这封信的大致意思是，学孔若仅拘泥于字句，则非遵孔，而是抑孔、损孔。西哲有言，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袭其意用之，则一切学问皆是当世的学问。张居正特别强调“好言上古之事，以异趋为高，动循衰世苟且之政，以循贾誉”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复古学风。

给金学曾写信不久，张居正又给南京国子监司业屠平石写了一封信，对如何治学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记》曰：“凡学，官先事，士先志。”士君子未遇时，则相与讲明所以。修己治人者，以需他日之用。及其服官有事，即以其事为学，兢兢然求所以称职免咎者，以共上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别开一门以为学者也。孔子周行不遇，不得所谓事与职者而行之，故与七十之徒切磋讲究。其持论立言，亦各随根器，循循善诱，固未尝专揭一语。如近时所谓话头者概施之也。告鲁哀公曰：“政在节财。”齐景公曰：“君臣父子。”在卫曰：“正名。”在楚曰：“近悦远来。”亦未尝独揭一语，不度其势之所宜者而强聒之也。

在这里，张居正进一步肯定孔子因地献策、因材施教的特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把研讨学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入仕为官之前，此时学习就以“修己治人”为主。入官之后，其研修学问则应以“称职免咎”为主了。前为励志，后为致用。他认为孔子之所以与七十门徒探求学问，坐而论道，是因为他周游列国而谋不到经邦济世的差事。由此可见，张居正的治学观崇尚务实而厌恶空谈。经他爬梳的孔孟儒学，立足于“用”而非稽古钩沉。

总而言之，作为帝师，张居正希望他的学生通过学习能够开阔自己的政治视野，于历史的典籍中发掘治国的文化资源。客观地讲，他是一个好老师，但从朱翊钧日后单独柄政的行迹来看，则可以肯定地说，他不是一个好学生。

四

在中国历史中，帝师与皇帝，既是师生，又是君臣。有时候，帝师很好皇帝却平庸。有时候，皇帝渴慕知识而帝师不能传授经邦济世的韬略。像诸葛亮之于刘备，魏徵之于李世民，刘伯温之于朱元璋，都属于千载难逢的君

臣际遇，如云从龙，如风从虎。

设想一下，如果让张居正碰上刘邦，或让他碰上李世民，那将是一种何等辉煌的历史气象！但是，历史不接受任何假设。他所有的“富民强兵”的智慧与呕心沥血的栽培，只换回一个以勤勉开始以昏庸告终的皇帝。数百年之后，仍让人扼腕叹息。

熊召政

2006年12月20日下午写毕

绪言

《论语》是孔子的言论辑录。孔子(前 551—前 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人,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五十岁后曾任鲁国中都宰、司空、司寇等职,后曾周游宋、卫、陈、蔡、齐、楚等国,不得任用,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教育和整理古代文献的工作。《论语》一书是孔子死后由其弟子辑录他的言论而成,所以反映孔子的思想极为广泛,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宝库之一。

教育 我国古代学在官府,孔子是第一个开办私学,把文化从贵族传播给普通人民的教育家,所以他特别重视教育,《论语》开篇第一句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学了要时时复习,不也很愉悦吗?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也很愉悦吗?人家不了解我,我却不怨恨,不也是君子吗?这充分反映了孔子对学习的态度:酷爱、谦虚和认真。他总结自己一生的学习经验:“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十五岁立志于学习,三十岁就有自立的成就,四十岁就通达事理,五十岁就懂得了天时命运,六十岁听言后即能知其旨意,七十岁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能随心所欲而不逾越规矩。他说他不是生而知之,他和别人不同的地方就是勤于学习。“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他的一切成就都是从学习中得来的。

孔子的教育思想是“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人无分富贵贫贱,他都能给以教育,他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只要给我十条干肉(见面礼)我从来没有不收他为学生进行教育的,所以孔子的学生家境贫寒者居多。他的教育方法是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有步骤地引导而诲人不倦。“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教导学生不到他想求明白而不得时不去开导,不到他想说出而不能时不去启发,举一通而不能推知其他三方面,就不必再重复教了。他认为学习对一个人非常重要,不仅是学知识,而且也是学做人。“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德行不修养,学问不讲求,听到正义的事不能去实行,错误不能改正,

这些都是我忧虑的。在他的学生中,他认为颜回最好,一次鲁襄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答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他之所以称赞颜回,是因为颜回学习之后品德有所提高,“不迁怒”,不拿别人出气,“不贰过”,犯过的错误不再重犯。“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孔子教育的科目是:历史文献、行为实践、待人忠心、与人交往信实。文,包括诗、书、礼、乐。

仁与忠恕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仁的象形原是两人相向而坐或立,汉代郑玄训为“相人偶”,即两人互相存问之意。所以仁的本意为人要互相亲爱和帮助。“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仁就是爱人,“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青年人,在家孝顺父母,出外敬爱兄长,行为谨慎,说话诚实,广泛亲爱大众,亲近有仁德的人。这里的爱人,是广泛的爱,没有贵贱等级的限制。“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仲弓有管理之才,所以孔子对他说:出门好像迎接宾客仪容整肃,役使老百姓好像承担大的祭祀谨慎慎重,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不要施加于别人,身在工作岗位没有怨言,回到家也没有怨言,这就是仁了。“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里很明确地说可以行之终身的就是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另一处,子贡又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子贡说:假若能给老百姓很多好处,算不算仁呢?孔子说:何止是仁,简直是圣人了,尧舜可能都难做到。至于仁,就是自己要立身于世,也要让别人立身于世,自己想通达于世,也要让别人通达于世,能够以自己为例而想到别人,这就是实现仁的方法了。这里明确提出实现仁的方法,就是要从自身出发,推己及人。一次孔子对曾子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参啊!我的思想是一贯的。曾子回答说:是!孔子出去之后,门人问曾子是什么意思?曾子说:夫子的思想就是忠和恕罢了。由此可见,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就是爱人,分而言之就是忠和恕。恕是要求自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是对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但孔子讲仁,也是有原则的。“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只有有仁德的人才能喜爱某些人、厌恶某些人。

孔子对仁的要求是相当高的,一个人部分地做到仁是可以的,但要全面做到仁则相当不易。一次鲁国大夫孟武伯问孔子:子路仁吗?孔子回答

说：“不知也。”又问，孔子说：“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子路可以在有一千乘兵车的国家里管理财政，但是否仁，我不知道。又问冉求如何？孔子说：“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冉求可以在有千户人家的地方做一个县长，百乘之家的封地作个总管，但他是否仁，我不知道。又问公西赤怎样？孔子说：“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论语·公冶长》）公西赤穿着礼服，可以在朝廷接待宾客，至于是否仁，我不知道。连子路、冉求、公西赤这样各有所能的大弟子都不能算作仁，可见为仁之难。孔子最喜欢颜回。他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颜回在心里三个月不违背仁，其余的人也只能每天每月想起仁罢了。

孔子讲仁，都是有所为而为的，不是讲空话。针对当时的人事政治，“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能够作到这五件，庄重不会受到轻蔑，宽厚会得到众人的拥护，诚实信用会得到别人的任用，敏捷勤快做事会有成效，慈惠能够使唤动人，也就是仁了。这是针对当时的为政者而言，相当具体。

仁与礼 仁与礼是不可分的。孔子主张复周礼，因为周代初年是古代的盛世，周礼是参照夏、殷两代的礼制而订立的。春秋时的各诸侯国是由周王朝授封而来，当时列国的纷争战乱不已。孔子认为都是由于周室衰微，诸侯不尊周礼，所谓礼崩乐坏，所以他主张复周礼。“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对于同一个问题，孔子针对不同的人的提问，便有不同的回答。颜渊是孔子认为学习和品德最好的学生，能够坚持仁，所以这个回答着重在复礼。但复礼的途径则是克己，去除自己一切违反周礼的思想和行动，完全在于自己，而不在于他人。不合周礼的东西不看、不听、不说、不做。因为仁是思想品德，是内在的，礼是节仪制度，是外在的。“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人若无仁德，礼有什么用呢，人若没有仁德，乐有什么用呢？“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礼呀，礼呀！仅仅是玉帛之类的礼物吗？乐呀，乐呀！仅仅是钟鼓之类的乐器吗？从当时礼崩乐坏的情势而言，孔子所说的复礼，仁是内容，礼是形式，仁是体，礼是用，两者有时互为表里。

一次孔子与子夏讨论《诗经》，“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带酒窝的笑脸多好看啊，美丽的眼睛黑白分明，洁白的底子上面画着花，这是什么意思？“子曰：‘绘事后素。’”（《论语·八佾》）先有白

色的底子,然后画花。子夏问:“‘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那是不是礼乐产生于仁义之后呢?孔子说:启发我的是卜商,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了。这里也明确说明了先仁义而后礼乐的关系。孔子虽然主张恢复周礼,但周礼已是历史的过去,无法恢复,而孔子对后代最有影响的则是他以仁为核心的忠恕思想。他肯定了人的独立意志和人格的价值,人在思想道德上不属于贵族,也不属于神。“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一国的军队可以夺去它的主帅,一个普通的平民不可以夺去他的志向。

礼之用和为贵。“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亦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礼的运用,以达到和谐为贵,古圣先哲治国之道的可贵之处,就是在于和,无论大小的事都要达到和,如有行不通的地方,还一味地为和而和,而不用礼来加以节制,也是不可行的。这是说礼之运用贵在于和,这是从历史经验中总结而来的,和不是为了和而和,而是有一定的原则即礼,和中也包含着异。“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论语·子路》)君子的和不是盲目附和,小人只盲目附和而不是真正的和。和的标准即中庸之道的“无过”和“不及”(《论语·先进》)不要超过也不要达不到,要恰到好处。

为政 孔子是主张德治而反对刑治德。“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用政令来引导人民,用刑罚来管理他们,人民虽然免于犯罪,但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人民,用礼制来管理他们,人民有了廉耻之心,而且情愿归服,这是孔子关于为政的总原则。他反对统治者单纯用刑罚来强迫人民服从,主张用关心人民疾苦的道德来争取人民自愿的服从,这样统治才能长久。“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用道德治理国家,自己好像北极星一样,在固定的位置上,有众多的星辰环绕着自己,这就是德治的好处,但德治的原则必须是统治者实行善政,以身作则,事事处处做人民的表率。“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季康子想杀掉无道之人而接近有道的人。孔子回答说:用不着杀人,只要你想给人民做善事,人民也就自然跟着善了。君子的德行好比风,老百姓的德行好比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用这个比喻来说明道德的感化作用。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政治就是端正,你自己带头端正,谁还敢不端正呢。当时鲁国公室衰弱,大夫季氏专鲁国政,季康子贪财增赋,已属不正,所以孔子如此

回答,要他率先端正自己。“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为政者自身端正,就是不发命令老百姓也能跟着实行,若自身不端正,即使有严厉的命令,老百姓也不顺从。这就是为政者行为表率的作用,政令必须和自己的行为一致。

君臣关系 古代是君主制,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君主,其他人都是臣民,如何确立正确的君臣、上下关系极为重要。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孔子在齐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做君的要像个君,做臣的要像个臣,做父亲的要像个父亲,做儿子的要像个儿子。齐景公听了说:好啊!要是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虽然有粮食,我能吃得着吗?这是因为当时齐国大夫陈氏专齐政,有不臣之心,威胁到齐景公的君位。孔子是反对以下犯上、以臣弑君的,所以齐景公有此发问,而孔子有此回答,这是针对齐国的特殊情况而讲的,并不是无条件的强调君主的权力。鲁哀公十四年(前481)陈恒果然杀了鲁简公。

正名 鲁哀公七年(前488)孔子在卫国,子路问孔子,卫君若请你帮助治理国家,何者为先。孔子回答说:必先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措手足。故君子名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论语·子路》)这是说,名分地位不正,言词就不顺当,言词不顺当,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制度就建立不起来,刑罚就不会得当,老百姓就会无所适从。所以君子使用的名义必须讲得出道理,能讲出道理必定能行得通。这是强调名分的重要性,名实应该相符。当时卫国的政治混乱,卫灵公在位时南子专政,太子蒯聩出逃至赵,卫灵公死后,立蒯聩之子辄继位,是为出公。诸侯欲送蒯聩而入而夺位不得,所以君臣名分不正。孔子强调正名,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讲的。孔子虽然重视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但他是很有原则的。“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也以礼,臣事君也以忠。’”(《论语·八佾》)鲁定公问,君主使用臣子,臣子服事君主,应该怎样呢?孔子回答说,君主应该以礼来使用臣子,臣子应该以忠心来服事君主,两者互为条件,君主若不采纳臣下的正确意见,臣下就可辞官而不臣。鲁定公十四年(前496),孔子为鲁国司寇,“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论语·微子》)齐国怕鲁国重用孔子,送来女乐给鲁国,季桓子接受了,三日不朝,孔子看到自己的主张不能实行,就辞官走了。孔子并不赞成对君主绝对服从的愚忠。

为政要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富而后教。“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

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孔子到卫国,冉有驾车,孔子说,人口多稠密呀!冉有说:人口已经很多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有说:已经富裕了,又拿他们怎么办呢?孔子说:教育他们。教育就是使老百姓增加知识和提高道德品质。

针对当时的情况,如何从政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子张曾问孔子,孔子回答说:“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论语·尧曰》)什么叫五美?孔子说:“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给人民以好处却不劳费,劳动百姓他们却不怨恨,爱好仁义而不贪得,庄重而不骄傲,威严而不凶猛。什么叫四恶,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即不加教育便行杀戮叫做虐,不事先申诫便要求成效叫做暴,起先懈怠突然限令期限叫做贼,同样是给人财物,出手吝啬,叫做小家子气。针对当时齐、鲁、卫等国的政情,只有崇尚这五种美德排除这四种恶政,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士 孔子出身于士,所以很重视士的品德。士,指一般读书人。“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读书人不能没有刚强的毅力,他责任重大而道路遥远,以实现仁为己任,不是很沉重吗?只有到死才能停止,不是很远吗?“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读书人立志于真理,而以粗衣恶食为耻,就不值得和他谈论道了。“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论语·子张》)士遇到危险时肯献出生命,见到有所获得时考虑是否合乎道义,祭祀时要想到严肃恭敬,居丧时要思念悲痛,这样就可以了。可见士是立志于追求真理,不怕穷困,具有坚强的毅力,勇于承担社会的重大责任,为了道义,遇有必要时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

君子与小人 君子有时是指在上位的统治者,小人指地位低下的劳动民众,但在广泛的意义上君子是指有道德和道德高尚的人,小人是指没有道德或道德很少的人,不分社会阶级地位。“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君子胸怀宽广,小人经常局促忧愁。“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君子通达道义,小人通达财利。“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君子和人团结而不勾结,小人和人勾结而不团结。“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君子有了过错,好像日食和月食,人人都能看得见,改正时,人人都仰望着。“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论语·子路》)小人对自己的过错,必定掩饰。具体而言,在当时怎样才能算是一个君

子呢？“子曰：君子以义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君子做事以正义为根本，以礼来实行它，用谦逊的语言说出，用诚实的态度去完成他，这就是君子啊。孔子关于君子小人的界定对后代的道德教育影响很大。

陈生玺

2006 年 12 月